

# 脱贫摘帽后原深贫山区乡村的经济韧性建构

## ——以四川省凉山州卢家营盘村为例

李晋 戴旭宏<sup>1</sup>

**【摘要】**本文立足脱贫摘帽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用“能力—资源”分析框架，结合 Barretta & Constas 提出的推进策略分类识别方法，分析了原深度贫困山区农村在新时期、新阶段构建经济韧性的一般逻辑。以四川省凉山州卢家营盘村作为样本，调查总结了一个西部山区村庄通过“整合三种资源、利用三种能力”，建构经济韧性并努力实现可持续反贫推进策略的阶段性经验，最终得到了几点启示。

**【关键词】**经济韧性 深贫山区 脱贫摘帽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70(2021)-11-0045(08)

### 一、引言

2020 年年底，脱贫攻坚如期完成，进入了解决“相对贫困”、推动减贫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时期，巩固脱贫成果、遏制“返贫”、解决“相对贫困”成了新课题。<sup>[1]</sup>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扶贫工作往往容易陷入“扶贫—脱贫—返贫—再扶贫”的封闭循环，<sup>[2]</sup>脱贫对象重返贫困是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中难以回避的问题。其中原深度贫困山区的“返贫”治理任务最重、难度最大、条件最苦，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该类地区经济整体的脆弱性和贫困韧性不易被打破。<sup>[3]</sup>中国是一个多山国家，脆弱的区域环境容易造成深度的经济脆弱性，经历史演变，山区已经成为高度依赖自然资源谋生的最贫困人群的集中区，绝大部分农村贫困人口都置身于这一空间的某一特定形态中，即使是在取得了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之后，山区脱贫群体中依然存在大量贫困边缘人口、因不可抗力陷入贫困境遇需要兜底的人口，“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情况仍然存在。

事实上，深贫山区的脱贫仍遗留了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其一，总体脱贫水平较低。现代农业产业普遍未能建立，带贫主体相对弱势，难以在治理相对贫困的新阶段构成内生主导力量，不能有效调动核心资源。其二，分化导致群体内部矛盾加剧。财政资金精准向贫困户倾斜，建档立卡户享受更多帮扶政策，客观上挤出了收入略高于贫困线的“边缘人群”，形成了“悬崖效应”，<sup>[4]</sup>受“政策性偏好”等影响，边缘户可能会自我选择进入“政策性返贫”，<sup>[5]</sup>成为山区脱贫脆弱性的典型代表。伴随着脱贫攻坚引入的新技术、新产业、新组织带来了市场的、自然的、社会的新风险，不彻底的、阶段性的结构变革进一步扩大了深贫村庄不同家庭的风险应对能力差异，<sup>[6]</sup>家庭返贫原因的埴变日趋复杂，也就难以聚合群体资源。其三，“候鸟式”相对贫困问题凸显。山区人力资本积累困难，对脱贫户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生计脆弱性又严重制约脱贫户的可持续投资。其四，在行政强激励下，脱贫路径的单一性与致贫原因的多元性产生冲突，在主体观念中体现为贫困文化持续的地缘传播和代际传递，<sup>[7]</sup>脆弱性脱贫人群持续累积在原深贫山区。随着行政主导的集中式扶贫逐步退出，在乡村振兴新时期亟待一种新理念，构建一种新格局，以应对脱贫摘帽后的挑战，这关系到山区的可持续发展。

“韧性” (Resilience) 更加关注系统遭遇风险后的适应和调节过程，可以用来解释高度复杂、脆弱和调节能力差的山区乡村

<sup>1</sup>作者简介：李晋 副教授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经营管理系 四川 成都 611131

戴旭宏 副研究员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7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项目“四川深度贫困区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模式与实现路径研究——以凉山州金阳县卢家营盘村为例” (编号：CR1927)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的发展过程。<sup>[8]</sup>“后扶贫时代”的贫困治理要从单纯的物质扶贫向物质、行政扶贫并举转化,进而实现扶贫工作常态化和制度化,<sup>[9]</sup>新的治理策略必须适应未来“多中心化”“去单一化”的趋势要求。由于“韧性治理”理念能够阐释系统吸收干扰、经历变化和重组后仍然保持或超越原有功能、结构、特性和反馈的能力,<sup>[10]</sup>可推动中国治贫实践由重点方向突破逐渐转向追求调适平衡的治理,<sup>[11]</sup>因而高度契合了脱贫摘帽后原深贫山区农村利用乡村振兴政策治理相对贫困的内在要求。

本文基于“经济韧性”概念,以四川省凉山州卢家营盘村为考察对象,发现该村通过“整合三种资源、利用三种能力”,不断增强村庄经济韧性,打破贫困韧性,形成了可持续的发展动能。此处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使用“韧性建构”而非在文献中更容易看到的“韧性治理”,并不意味着排斥治理的内涵,“建构”展现手段,强调实施“治理”的推进策略,其目的是最终实现维持稳定和促进变革的治理。在时间维度中,本文侧重于战略框架中短、中期内容的建立和构造,是实现创新的基础,这样的优势是在案例分析中避免了对Holling四阶段的判断,并重点关注各个要素的联动和积累,以及其后稳定性形成的基础作用。

##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1. 概念演变与定义

在过去20年,“韧性”理念已经逐步成为国际发展领域研究前沿的主流范式。相较于城市,中国农村的经济规模普遍偏小,经济结构很多还呈现出小农经济的特征,使用“经济韧性”概念分析贫困地区乡村具有一定合理性:农村社区韧性可以更准确地对应韧性“生态-社会系统”的概念语境。<sup>[12]</sup>使用“经济韧性”概念作为分析中国深贫山区农村发展问题的框架基础,有四点优势:一是可以促进不同村社之间的合作;二是可以有效将“扶持”“救济”与发展联系起来,并形成创新方案;三是在实践中,可将相关测度衡量工作的重点放在能够更系统反映动态、多维韧性的指标和数据上;四是更加强调长期的预防措施而不仅仅是短期的反应。

### 2. 理论基础

(1) 三种能力。本文“经济韧性”描述下的能力不应仅仅是对初始状态的一种“恢复”能力,经济韧性表现为:与经济增长持久力有关的吸收(Absorb)、经济增量调整或变化的适应(Adapt)能力和导致经济结构变革性转型的转换(Transform)能力,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反应在概念上可以与不同强度的冲击或变化相联系。

①吸收能力。冲击的强度越低,个人、家庭、乡村就越有可能有效抵御并吸收冲击的影响而不改变其功能、地位或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贫困山区农村家庭的吸收能力主要来自于各种应对策略,其成员通过这些策略缓和或缓冲冲击对其生计和基本需求的影响。比如,通过同时调整家庭库存和平滑消费的自主保险机制,缓解对生计稳定性的冲击。

②适应能力。作为对吸收能力的补充,个人、家庭和社区可以行使适应能力。适应能力是指人们为了应对冲击或日益增长的压力而继续运作,在不对其运作方式进行重大改变的情况下,对经历变化的各种渐进式适应手段。这些调整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譬如,山区农民采用抗旱作物、修筑新的灌溉系统、兼业经营住宿业和零售业等,以及使用贷款或连接到新的社会网络等。

③转换能力。如果冲击或压力变化大或过于频繁,以至于超出了家庭(或社区)的吸收和适应能力,那么就必须采取某种形式的转型应对。Nelson等将转型能力定义为“因‘适应性’韧性不足而产生的过程”。这些反应之所以被认为是变革性的,是因为它们旨在永久地、大幅度地改变系统的传统功能或结构,以确保家庭的直接“生存”。非洲干旱把从事畜牧业的牧民推移到城市、中国改革出现的“民工潮”以及由此产生人口向城市的迁徙都是这种转换的例证。

#### (2) 三种资源

资源短缺和资源的脆弱性是贫困地区乡村经济韧性构建的逻辑起点。贫困是资源脆弱性在生产要素、社会资本等层面的现实表现。扶贫就是要解决贫困地区资源短缺问题，要实现以市场为主的要素配置机制，就需要在经济韧性的建构逻辑中、在承受外部干扰或风险冲击的能力中嵌入资源实现和整合的逻辑和目标。当前，参与深度贫困地区减贫治理的资源格局中，有三种不同的资源形式：“公资源”“共资源”“私资源”。反贫困是三种资源组合、调适产生的治理资源配置结果。<sup>[13]</sup>

①“公资源”。“公资源”体现了公共部门的再分配原则，通常指来源于政府公权力部门的项目、资金、政策配套等资源要素。“公资源”因具有符合国家政策倡导、符合贫困地区脱贫期待的行为合法性，且具有带动贫困村脱贫致富的强绩效，所以成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发展的基础性要素。

②“共资源”。“共资源”体现了社区的互惠原则，通常指农村社区内部家庭共同体、邻里支持网络所赋予的凝聚力、社会资本等资源要素。“共资源”历来具有较强的自助能力，而“公资源”却往往因下沉能力和渠道受阻而影响力有限。在当代，“公资源”往往是通过村集体、合作社等“共资源”经济组织发挥作用的。

③“私资源”。“私资源”代表着市场的交易原则。虽名为私，但有两大来源：一方面是指参与扶贫的企业、公司等营利性组织提供的资金、发展机会等资源要素；另一方面是贫困村内部的个体或家庭参与的对村社的资源投入。“私资源”的划分更多地体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市场逻辑对基层治理的补充，与政治逻辑的“公”形成对比，但同时也受“公资源”和“共资源”的影响。

### 3. 基于“能力-资源”的分析框架

经济韧性的时间内涵，强调了三种能力具备一定的线性关系，三种资源在实践中也有一定的时空规则，譬如公共资源要发挥先导作用，引出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因此韧性三种能力与社区集体整合三种资源具有一定的耦合性，本文建立并简化了这一关系，通过整合韧性治理理论与资源要素，提出了基于“能力-资源”的分析框架。

#### (1) “吸收能力-公资源”关系

扶贫的“韧性”实践，其实质就是构建一个由外力帮扶到具有自我恢复力的脱贫机制。逻辑上，韧性首先体现的是组织利用现存或已有的资源实现“触底回弹”，再发展新的能力对动态环境加以适应，并最终形成新的结构。韧性不是脆弱性的反义词，它天然包容了应对脆弱性的所有手段和行动，当然也包括短视的、负面的、情绪的应对。因此，要实现经济韧性的建构和有效治理，避免社会达尔文主义，就需要引入强力的外部资源。“公资源”所代表的公共管理部门进行的资源再分配，能够发挥托底的强大作用(如各类社会保障、建档立卡户的扶贫专项、生产资料购买补贴、小微信贷财政贴息等)，可以有效将农村贫困家庭从低水平的、陷阱式的、短视的困境中解放出来，引导群体采用具有可持续的风险缓释手段和生计策略。由此，可以看到“公资源与吸收能力”的简单关联。

#### (2) “适应能力-共资源”关系

“共资源”体现村庄集体力量。当受到风险冲击时，资源短缺地区的乡村集体力量吸收、整合已有资源，将重新设立集体运营模式(如新的红利分配方式、新的土地收益和使用分配方案等)，这一过程主要体现的是受冲击个体/家庭的适应能力，即从适应到建立新规则的过程。在这一时空中，“吸收能力-公资源”并未退出，而是继续发挥基础性作用，体现为从“吸收到适应”“公资源引导共资源”的演进历程。在扶贫的经济韧性实践中，往往是公共部门提供平台引导村(社区)集体发展自主的、自由的、外部协调的经济组织(如成立合作社、村集体资产管理公司等)，在未对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作较大调整的前提下，重建并保持原有的经济状态，并且初步拥有了在遭遇各种不确定风险时相应的抗压力。“适应能力-共资源”关系还强调了面向载体的经济韧性建构，主要是家庭或村社与依附于生态、自然、环境的生产方式的和谐包容关系。

### (3) “转换能力-私资源”关系

转换能力强调的是彻底改变原有的经济系统并重建经济韧性，“私资源”强调市场规则以强化要素流动。在资源短缺地区，要实现这种高水平、高质量的市场化，必然要经历一种“转换”和变革。没有“私资源”充分参与的转换可能短暂而不可持续。值得注意的是，“私资源”并不是实现转换的必然条件，如历史上大灾后的抛荒、乞讨、流串都是“公、共、私”资源几乎完全退出后发生的一种极端负面意义上的“转换”。因此，本文的讨论均是建立在实现培养农村家庭良好的、长久的抗逆力基础上，并将“经济韧性”的建构过程看成是“私资源”的培育和“转换能力”正向导引并行的过程，表现为韧性主体都有意愿地提升能力和培育创新意识进而实现自我内生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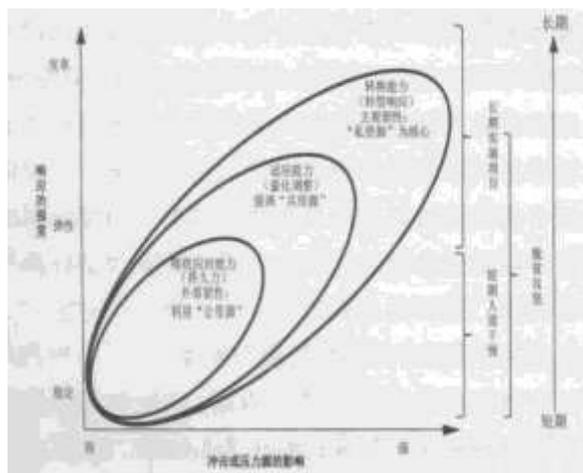


图1 “韧性”三种能力与“能力-资源”分析框架

由此，本文建立了一个不尽完整但简洁朴素的分析框架（见图1），将通过案例对三种资源的使用与整合考察经济韧性的建构策略和过程。

## 三、案例分析：卢家营盘村的经济韧性建构

作者因参与所在高校“校地合作”项目，前往凉山州卢家营盘村参与对口扶贫活动，多次进行田野调查，亲身体会了山村地域的经济韧性构建的部分场景。本文尝试以卢家营盘村为案例，使用“能力-资源”分析框架，勾勒出脱贫摘帽后原深贫山村通过建构经济韧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场景。

### 1. 卢家营盘村的基本情况

卢家营盘村位于四川省凉山州金阳县红联乡（据《2021年金阳县部分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方案》，撤乡并镇后属芦稿镇），有6个村民小组，209户，共1172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78户468人，2015年已脱贫6户36人，剩余70户424人在2018年底实现脱贫（其中2户8人因政策原因取消贫困户资格）；从地理位置看，该村处于我国西部原贫困地区，山大沟深，山地比重较大，农用土地的生产力也较低；同时，大山阻隔，恶劣的环境等因素直接导致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不善，严重影响商品的正常流通。

仅就该村7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资料看，2014年人均纯收入最高仅2690.40元，最低1000元。从2018~2020的情况看，脱贫增收成效显著，工资性收入和青花椒的贡献最为显著，在人均纯收入中的占比三年来分别为71.80%、82.86%、71.65%，成为脱

贫决定性力量，而转移性收入在人均纯收入中的占比三年来分别为 10.64%、8.33%、12.70%，如此明显的影响正是“公资源”作用的例证。在外部风险冲击下（始于 2020 年初的疫情影响），以工资性收入为代表的转换能力受到明显影响，2020 年相对于 2019 年的人均工资性收入下降了 26.5%，花椒收入的略微减少也不排除大小年的可能。

## 2. 卢家营盘村整合三种资源建构经济韧性的措施

### （1）以顺滑“吸收”为目的，夯实经济基础，确保“公资源”的衔接落地

经济韧性治理应当以完善基础设施和健全政策、制度等为手段。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韧性治理，需要有两大大系统的紧密配合：一是国家权力系统的运行，它与财政能力、各级政府执行力、政策运行等密切相依；二是人的权力系统的发挥，它需责、权、利一致。<sup>[15]</sup>同样，以公共政策为主的风险隔离系统为卢家营盘村的脱贫户和边缘户打造了一堵“防风墙”，激励了村内脱贫户和边缘户，在传统的家庭风险分担机制上建立“国家一村一家庭”的保障机制，这些家庭已经“吸收”了由“公资源”所嵌入的新的风险缓释手段，如购买农村社保、购买农业保险等，并积极申报由财政资金支持的产业发展项目，积极接受由政府支持的科技服务团的咨询服务等。

①用好帮扶生计补贴。作为原深度贫困村，卢家营盘村继续用好政府的脱贫户帮扶支持政策，在脱贫不脱政策的原则下，把防“返贫”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工作重点，继续做好政策宣传，推动脱贫户和边缘户的乡村建设共同行动，继续支持扶贫车间建设工作，把财政性转移支付用到该用的地方。

②公共品建设改造。利用好当地“三建四改五洗”工程，积极推动卢家营盘村“五好”创建，作为“公资源”在村的代理者，县乡两级政府积极宣传，认真配合，争取了危房改造、扶贫新居、小水利建设工程、道路硬化拓宽工程、安全饮水工程、水土治理与山体加固工程在卢家营盘村的落地，并取得相应的财政资金补助。

③推动校村合作。充分挖掘对口单位的技术资源，建立常态联系机制，推动对口帮扶捐赠、教育帮扶和产业帮扶工作，通过引入以购代捐项目和红联乡中心校计算机捐赠项目，建立了特色产业营销的过渡机制，并邀请市场营销专业团队为青花椒产业发展献计献策，给脱贫户树立“技术更新带动产业升级”的理念。此外，依托教育资源，以学生入村宣讲、共建校村实习研发基地等扭转“等靠要”等思想。

④用好产业担保基金。扶贫产业基金不仅提供必要的创业启动资金，更是由于与当地担保公司、担保基金特定的合作关系，可以实现以较低成本发展特色产业。青花椒是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卢家营盘村利用产业扶贫专项基金继续支持脱贫户开展花椒种植，脱贫家庭已经开始逐步改变过去的粗放经营模式，依照科学方法，增加投入，购买新式生产工具（如电力风干机）、绿色农肥，邀请科技人员下乡指导，持续加大对土地的投入。

### （2）以完整“适应”为目的，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共资源”的扎根成长

贫困山区农村日益空心化、原子化，“留守户”多为小生产方式，无力大规模承接“公资源”，“因户施策”等普惠性扶贫手段也只是在“吸收”低水平的生计方式。资源匮乏的村庄发展集体经济的关键之一是要实现资源共建，依靠村庄的社会资本共建“共资源”，破解资源匮乏困境。<sup>[16]</sup>要激励脱贫户从被动“吸收”到主动“适应”，就必须激活“共资源”的池塘作用，发展集体经济、社区经济。本质上，观望心态、“等靠要”思想，是贫困个体避险逻辑下的理性选择，易导致山区乡村低水平维持型发展。因此，做大做强集体经济，要坚持党的领导，从树典型、强带动开始，以能人投入“共资源”的“第一股”，带动脱贫户、边缘户主动“适应”增量性变革，是推动村社实现公共性不断再生产、“共资源”有序发展的策略。

①民主治理建设。凝聚共同的经济资源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发挥村两委在村庄（社区）内的权威和领导作用。卢家营盘村村两

委经济工作中的首要原则就是严防把集体经济改弱了、改小了、改垮了，防止集体资产流失。伴随着改革的深入，集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如股权固化容易导致集体经济股权纠纷现象。村两委时刻保持警惕，建立动态跟踪监督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运用各类政策资源，采取动态管理模式，严防过度开发，进而影响其他成员收益，损害村集体利益。

②发挥领头雁牵头作用。利用村内能人带头作用汇聚资源，吸引村内社会资本，挖掘、汇聚资金和人才。同时，领头雁人物也号召普通村民参与准公共品建设项目的筹资，如兴修小水利、道路改造等。

③发展合作经济组织。以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青花椒种植合作社、观光旅游合作社)推进企业、合作社和帮扶对象以产、销、利联结，通过每年统一分红方式，将分红发放到贫困户，使贫困户切实享受到各方扶助及利益。

④打造特色村域公共品牌。卢家营盘村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在青花椒种植、加工和观赏方面积累了良好的口碑和声誉，促成“卢家营盘村”这一山区地域品牌的形成。由于地域品牌具有准公共物品的特征，因而“卢家营盘村”品牌的形成，标志着“共资源”发展到一个新高度。

### (3) 以实现“转换”为目的，畅通市场渠道，激活“私资源”的有序增长

“私资源”是深度贫困地区实现真脱贫、稳脱贫的重要力量，深度贫困山区的脱贫对环境要求极高。卢家营盘村这样的西部贫困山区毫无区位优势，保障体系的建设成本高昂，正常流通障碍重重，虽然有各级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各种帮扶行动，而“私资源”进入的壁垒依然较高。因此，卢家营盘村以增强村民的“转换响应”为抓手，积极引导“私资源”的参与，努力实现经济韧性长期治理。

①强激励汇聚内生“私资源”。要提高乡村创业者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认识和理解，激励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学习先进经验，创业创富，打造致富蓝图，引导周围的村民共同致富，就必须从转换村庄内不同群体的意识入手。从留守农村和返乡群体中挖掘致富能人，强化其带头作用，并扭转部分村民不愿投资却想利益均沾的“等靠要”思想，构建能人大户、贫困户与集体经济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和可持续的受益机制。

②理顺通路引领外生“私资源”。外部资源进入深贫山区村庄的最大障碍就是盈利的可能性。卢家营盘村应建立监事规则和组织，尽可能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引入龙头企业、物流电商平台等，破解花椒、魔芋、土豆等产品滞销难题，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市场主体盈利能力。

### 3. 以推进实践为视角的“能力-资源”框架对经济韧性建构策略分析

Barretta & Conostas 介绍了一种以治理贫困为目的，以建构韧性为目标的项目分类识别标准。他们将具有破坏性的干预(Disruptive intervention)策略大致分成三种：第一，以“转移人们当前状态”(Shift people's current state)为准的策略。比如通过公共性转移支付，增加培训教育，提供医疗保健服务或其他能提高受风险冲击者能力的手段。这一类型的策略在理论上的作用空间较小，一般是在绝对贫困人数较少的条件下才能发生作用，本质上是通过简单“转移状态”完成经济韧性建构，对禀赋条件有较高要求，因此这种方式多发生于发达地区。第二，以“缩小风险敞口改变条件分布”(Alter the conditional transition distribution by reducing risk exposure)为准的策略。未承保的风险暴露情况变化改变受冲击者的行为，从而改变他们的动态条件期望。理论上，该措施可在一定条件下逆转第一种措施引致的状态。第三，以“改变潜在的系统结构”(Change the underlying system structure)为准的策略，包括但不限于推动习俗、文化、经济或社会政治体制变化，或大规模引进新技术，或引发市场格局的根本性变革，诱发整体性的结构变化。

本文将卢家营盘村在脱贫摘帽后所进行的经济建设重新放置于这一理论分类空间中，结合“能力-资源”分析框架，得到

---

了两条标准并行的经济韧性建设策略。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短期—长期”维度的策略排序与“容易—困难”维度的排序并不一致，此结果并不符合人们纯理性逻辑上“先做简单的、后做困难的”的直观认识。具体来说，有以下两点发现值得思考：

(1) 经济韧性建构的三种基础能力，呈现出相互重叠的形态

尽管在逻辑上与 Bene 等在其经典文献中展示的包容递进关系是一致的，但这种重叠的形态更具内涵。一方面，吸收能力是发展受冲击者适应能力的基础，如卢家营盘村对公共品的建设和院村合作有助于深化自治组织建设；另一方面，适应能力也需要反哺吸收能力，如发挥领头雁作用、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和打造村域公共品牌需要反过来支持生计补贴和产业担保基金的利用。相同的情况也同时发生在“吸收—适应”“适应—转换”的关系中。这说明，三种能力的发展可能是非线性的，“适应”能力的出现不以完整的“吸收”能力为必要条件，他们两两之间的催化作用可能会率先发生在局部。在实践中可能意味着，要基于村庄建构经济韧性，必须要走多元化策略，如推动多中心多主体发展，要兼顾托底与激励的方略，无论经济韧性建设处于任何阶段，都要将“推”和“拉”两种力都使出来。这也证明了“公资源”与“共资源”需要同步介入村庄经济发展，不能坐等政府转移支付的“救济”，且没有良好村庄集体经济环境建设，也不可能最大化“公资源”利用效率（如扶贫车间建设维护、产业担保基金的合理合规使用）。

(2) 要成功实施以“缩小风险敞口改变条件分布”为准的完整策略，就需要整合运用“公、共、私”三种资源

像卢家营盘村一样，脱贫摘帽后的村庄大部分所进行的项目策略大多处于这一阶段。缩小风险敞口需要综合“三种能力、三种资源”。卢家营盘村发展青花椒产业，很难找到合适、靠谱的种业公司，也找不到合理稳定的销售渠道，村两委和产业能人需要汇集全村人力资源，成立合作社并建立监事规则，通过乡政府寻找农业技术服务龙头公司，成功对接村企需求，整合村庄资源、向政府和主管部门主动汇报、积极拓展公共关系交流，方能实现既定策略。

## 四、研究启示

本文立足脱贫摘帽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用“能力—资源”分析框架，结合 Barretta & Consta 提出的推进策略分类识别方法，分析了原深度贫困山区农村在新时期、新阶段构建经济韧性的一般逻辑。以四川省凉山州卢家营盘村作为样本，总结了一个西部山区村庄通过“整合三种资源、利用三种能力”，建构经济韧性并努力实现可持续反贫推进策略的阶段性经验，得到以下启示：

1. 用好“公资源”是贫困山区农村在脱贫摘帽后建构经济韧性的首要条件

本文的案例结论与西方部分学者坚持“政府干预降低社区经济韧性”的新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论调显著不同，卢家营盘村在禀赋资源普遍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拧紧了“公资源”这把启动深贫山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钥匙，充分利用公共部门的各项优惠政策，初步建立起了内外协调的资源整合渠道。这是因为，当公共的、现代的经济要素因被动、人为地引入到山区农村之时，要素组织的形成与其功能的发挥过程也是不断深化山区家庭或个人面对经济不确定性时主动“吸收”的过程，是对脱贫户和边缘户参与韧性建构的初始能力的培训。因此，要彻底结束贫困山区内卷的历史常态，就必须要有公共部门有序介入。

2. “共资源”是实现“乡-村-外部”多主体互动，推动经济韧性建构策略有效实施的最真实平台

“公资源”是基础，“私资源”是最终途径，而“共资源”是实现资源整合有效、耦合“吸收、适应、转换”三种韧性能力的最优载体。卢家营盘村实践的特别之处，在于该村并不仅仅是把“村集体”看作是一种法律上定义的经济集合体，更重要的是在共同体上创造性地衍生出了监事机制，并相应地发展了实施该机制的规则和组织。集体参与可以有效缓解公共强干预下，对价格发现和激励机制的扭曲，具体来说就是以集体名义既调动了能人乡贤的积极性，也抑制了乡村“精英俘获”现象。

### 3. 脱贫摘帽后原深贫山区农村建构经济韧性的近期策略应该聚焦于推进实施“缩小风险敞口改变条件分布”类型的实践

要大力巩固精准扶贫阶段个体或家庭塑造的经济韧性吸收能力、逐步培育转换能力，重点是不断强化适应能力，目标是要改善山区村民，特别是脱贫户或边缘户的风险偏好，山区村庄用好既有的接续政策，包括用活脱贫摘帽后的财政补贴以及当地的产业发展基金为村民构建外部保障机制；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创收平台，鼓励产业能人发挥领头雁作用，努力争取政策性保险、政策性普惠信贷对村庄产业的支持；山区村庄的经济韧性必然是与生态韧性高度一致的，村内要建立监事规则及其组织，平衡好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生态和谐的关系。

### 4. 脱贫摘帽后原深贫山区农村建构经济韧性的长期策略应时刻关注心理韧性的建设

不仅要反对个人的“等靠要”思想，在集体层面更是要坚决反对“拈轻怕重”的工作作风。本文研究发现，在发展经济韧性的初期也必须直面部分痛点事务。比如，要在留住人才方面有通盘考虑，“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要能立足长期规划，不能拈轻怕重、挑肥拣瘦，村集体负责人、能人大户等要积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扬奉献精神，在打造村集体特色品牌方面早谋划、早研究、早行动，要按高质量发展山区经济的标准约束自己，形成合理的同龙头企业等外部主体的利益联结和分配机制，从内部破解山区个体文化因素中长期存在的“不自信、无目标”的“等靠要”思想。

#### 参考文献:

- [1]关信平. 论现阶段我国贫困的复杂性及反贫困行动的长期性[J].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01).
- [2]黄承伟. 新中国扶贫 70 年: 战略演变、伟大成就与基本经验[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06).
- [3]钟凯. “后扶贫时代”深贫地区贫困治理的理论思考——基于四川省贺波洛乡的实证考察[J]. 农村经济, 2020, (11).
- [4]王杰森. 后扶贫时代脱贫内生动力培育的长效机制研究——基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04).
- [5]沈权平. “后扶贫时代”东北边疆民族地区返贫预警机制研究[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0, (06).
- [6]关信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条件下我国普惠性民生建设的方向与重点[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0, (05).
- [7]唐任伍. 贫困文化韧性下的后小康时代相对贫困特征及其治理[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05).
- [8]雷晓康, 汪静.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贫困地区韧性治理的实现路径与推进策略[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01).
- [9]易柳. 精准扶贫政策的粗放执行及其治理: 基于可行能力的视域——以鄂西 L 村为例[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01).
- [10]陈轶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韧性研究进展与展望[J]. 小城镇建设, 2019, (11).
- [11]翟绍果, 张星. 从脆弱性治理到韧性治理: 中国贫困治理的议题转换、范式转变与政策转型[J]. 山东社会科学, 2021, (01).

- 
- [12]张甜, 刘炎序, 王仰麟. 恢复力视角下的乡村空间演变与重构[J]. 生态学报, 2017, (07).
- [13]孙迎联, 向勇. “后扶贫时代”的减贫治理何以有效? ——基于晋东 T 市 H 镇的考察[J]. 学习论坛, 2019, (03).
- [14]杨国安. 国家权力与民间秩序: 多元视野下的明清两湖乡村社会史研究[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 [15]邓大才. 关于国外反贫困政治学研究的研究[J]. 学习与探索, 2021, (01).
- [16]周立等. 资源匮乏型村庄如何发展新型集体经济? 基于公共治理说的陕西袁家村案例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21, (01).
- [17]温铁军等.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股权固化需谨慎——基于 S 市 16 年的案例分析[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8, (05).